

苏联作家群体作品选
复活的苏联作家群体作品选
选复活的苏联作家群体作品选

寿静心 编

张来民

河南大学出版社



复活的苏联作家群

作 品 选

寿静心 张来民 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复活的苏联作家群作品选

寿静心 张来民 编

责任编辑 理 衡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75 字数：295 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3.90元

ISBN7-81018-217-X/I·29

谈谈我和“复活的苏联作家群”

——代序

薛君智

回想50年代下半期，我正攻读俄苏文学副博士学位期间，传来了我所敬爱的苏联革命作家法捷耶夫自尽身亡的噩耗。当时我的苏联导师柳鲍芙·伊凡诺夫娜·库拉科娃教授告诉我说，早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不久，曾经长期担任过苏联作协总书记的法捷耶夫就日益受到被恢复名誉的作家们及其亲友们的谴责，那些作家多半是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下半期受到批判或被镇压的。库拉科娃教授给我介绍了一些这类作家的情况，这就是我最早获得的关于本书的“作家群”的信息，也是我对他们发生兴趣的开端。

从那时以后，在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执政的时代，“作家群”们的名字虽时有所闻，但仍若暗若明、时现时没，他们还没有得到全面彻底的平反。他们的许多主要作品始终没有问世，偶而发表的为他们平反的文章也往往闪闪烁烁，比较抽象空泛，苏联科学院和高教机构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对他们大多是提提而已，专著论述更寥寥无几。因此，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依然是他们那些被批判过的罪名和过错，人们对于他们的底细仍旧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那些年代里，我虽有志对他们作一番考察研究，但囿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研究工作无资料本源，自然产生“无米之炊”的困难。虽是“壮志未酬”，我也只好暂时作罢了。

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和对外开放的大好形势下，80年代以来，我有幸得到两次机会去西方搜集有关二三十年代苏联文学状况的资料。在前后两年多时间里，我埋首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档案馆、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伊利诺埃大学斯拉夫语文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还涉猎了巴黎、伦敦、日内瓦、多伦多等地大学的斯拉夫语文部的藏书。在探索早期苏联文学史、批评史的过程中，我同时获得了“作家群”们在苏联国内被禁止出版或重版的许多原著，从二三十年代直到现、当代苏联文学界关于他们所开展的争论的资料，以及苏联国外有关他们的各种评论著述。这个“发现”，为我提供了着手研讨“作家群”们的可能，我这些年来对他们的研究就是这样开始进行的。

列宁曾经说过：“为了真正了解事物，必需全面掌握它的所有方面，它的所有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不会彻底做到这一点，但是对于全面性的要求，可以防范我们犯下错误和陷入僵化状态。”（《列宁全集》第42卷第290页）列宁的教诲鼓舞了我，加强了我从事“作家群”研究工作的信心。我认识到，如果舞台上的演出只有主角，而没有配角或反角，文学作品的写作中只有正面英雄，而没有中间和反面人物，那么，主角与正面英雄人物的巨大形象也就难以确立。这台演出和这部作品也就比较难以全面地反映出历史和生活的真实。同样地，如果不探讨“作家群”们的创作，给他们以应有的地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们的意义与价值，苏联文学发展进程的全貌，也就不能被充分地理解和显示出来。正是在列宁观点的指导下，我决心在苏联文学史的研究领域中，担负起“补空白”的任务，以防在这个领域内“犯下错误或陷入僵化状态”。

然而，在着手开始对“作家群”们的研究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他们、给他们以什么样的应有地位的问题

题。正是这个时候，在清算“文革”十年浩劫中的极“左”思潮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工作者们也提出了应该给予沈从文、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张爱玲等作家在文学史上以应有的地位的问题。这一行动给我一定的启迪。但是，当国内外有些人把沈、郁、徐、戴、张等人与中国革命文学的伟大先驱者鲁迅对立起来，甚至把这些人的地位作用看得超越鲁迅时，这种观点引起了极大的反感。经过探索和思考后，我形成了自己的明确看法。我认为，我们的确应该使“作家群”们“复活”起来，加以研究，使之得到再生，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掌握苏联文学的发展进程并探索其内在规律。但是，从过去直到今天我所熟悉和喜爱的苏联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们，他们永远是苏联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主流，是他们创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我们决不能将“作家群”们在苏联文学史中的地位置于以高尔基为首的主流作家们之上，如果那样，将会完全歪曲和违背历史的真实。

事实上，在探讨“作家群”们的开始阶段，我的这个研究课题，完全是“冷门”。它曾经受过歧视，甚或遭到非议，我自己也曾产生过“是否会被戴上异教徒帽子”的想法。不过，我没有气馁，没有放弃我的“冷门”课题。相反地，令我感到高兴和惊喜的是，我在探讨“作家群”们的创作道路，了解他们各自独特的创作个性，以及摸索他们在苏联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复杂经历之同时，我比过去更清楚地、更深入地认识和领会到了高尔基、法捷耶夫这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伟大作家为苏联文学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他们对苏联作家们（包括“作家群”中的一些人）的成长所进行的热情帮助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也就更充实了我对他们的崇敬和爱慕的感情。因为，事实的真相是，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事物是有它的多方面性的，事物之间是存在着各种联系和“中介”的。“作家群”们的出现、成长、发展和

消逝，原来都和文学主流的发展是有联系的，是互相交叉的。当我欣喜地看到这两个方面，更多地认识了主流作家们和“作家群”们双方之后，纵然我的拙笔尚未能尽情地写下这可喜的体会，但可以肯定地说，我已经开始遵照列宁指示的“对于全面性的要求”的方向迈步了。

1985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的新领导人。在他大力倡导的“改革”中，自1986年开始，尤其从1986年6月第八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以来，“作家群”们日益公开地、大步地、甚至喧闹地返回苏联文学界，他们的作品和有关他们的评论连续不断地出现在苏联国内各类文学和其他政治社会性报刊上。莫斯科大学别拉娅教授开设选修课《未被充分研究的作家们》，课堂中非但座无虚席，而且站着听课者都拥挤得几乎无立足之地。这种趋势随着苏联“改革”的深入看来还在发展。与此同时，这趋势在我国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例如，一部《日瓦戈医生》连续出版了四种译本。于是，在这种新形势下，“作家群”们似乎也更急切地涌现到我面前了。我发现我所从事研究的原本是“冷门”的课题越来越热起来了。这种情势引起我的深思，以至反思。且不说，在当前苏联文学界本身对于“作家群”的再现尚存在着某些争议，形似大势所趋，实则众说纷纭；也可不必重复强调，我仍然只愿担负“补空白”的任务，并毫不向往进入“热门”。我只想从我的实际研究工作出发，根据我从近年研究工作中获得的进一步体会来谈谈对“作家群”们本身的看法。

在我对“作家群”们的研究中，我深感“作家群”们都非常有独特性，有独特的创作个性。正是这种独特的创作个性，按照文学发展本身的内在规律，产生出他们的文学创作价值，他们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以及他们对青年作家们的巨大影响。他们的创作个性主要体现在他们的艺术风格、艺术技巧、艺术语言中。

就是说，他们在艺术上各有成就，各有千秋，各有所长。正是他们的艺术形成一笔笔丰富的文学遗产，它们不应为后代所遗忘。不过，“作家群”们在政治上往往比较亏弱，或不够成熟，或没有牢固地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因而他们的文学创作在思想性方面常常存在缺陷，甚或确实犯有某些严重的错误。当然，这一切不应象过去那样成为他们的罪过，从而把他们“一棍子打死”。因此，如果我们今天使“作家群”们仅仅在“政治上”复活，那他们本身的文学价值与优势就难于显示出来。所以，我们面临的任务恰恰应该是，要使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恢复名誉，而且还要在艺术上真正“复活”起来，使他们的文学遗产和艺术成就得到继承和发展，使他们在再生之后得以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流作家们一起，共同交织成一幅苏联文学发展过程的全面图景。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寿静心和张来民二位同志编选的《复活的苏联作家群作品选》一书，是一件好事。该书选入的10位作家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们不仅在苏联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西方各国都有很大影响。选入的作品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而且与作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编者在选入这些重要作品的同时，对每个人选作家的生平、创作，特别是作家被批判的经过、遭遇以及“复活”的过程分别作了简明扼要的客观介绍，使这本书既具有独特的文学性，又具有丰富的史料性。虽然近几年来国内报刊对这些作家作品作过介绍，但比较零散，本书的编选，对于我国广大文学爱好者，文学研究者，作家以及文艺管理者，比较全面地了解苏联文学，总结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经验教训，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对“作家群”们的深入研究。

1987年10月29日于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前 言

在20世纪苏联文学史上，这已不是个别的现象：一位被埋没多年的伟大作家突然被重新发现——他的名字赫然重新出现在中央报刊上，他的“罪名”被平反昭雪，遭到批判和长期禁锢的作品，被重新出版，并受到高度评价，他的声誉与日俱增……他好象从阴森的地狱一下子跨入了明丽的天堂，好象死而复活的耶稣，引起整个社会的欢腾。所谓“复活的苏联作家群”，就是我们对这类在苏联文学史上曾经遭到错误批判后来被恢复名誉的作家群体的总称。

复活的苏联作家群大致包括从20年代至80年代一大批命运坎坷的作家。其中主要有：谢尔盖·叶赛宁（1895—1925年）、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1891—1940年）、米哈伊尔·左琴科（1895—1958年）、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年）、玛丽亚·茨维塔耶娃（1892—1941年）、尼古拉·古米廖夫（1886—1921年）、安德烈·普拉东诺夫（1899—1951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年）、奥西普·曼德尔斯坦姆（1891—1938年）、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1年）、叶甫盖尼·扎米亚京（1884—1937年）、鲍里斯·皮里尼亚克（1894—1937年）、伊凡·布宁（1870—1953年）、康斯坦丁·巴尔蒙特（1867—1642年）、安德烈·别雷（1880—1934年）、费奥多尔·索洛古勃（1863—1927年）、尼古拉·扎鲍洛茨基（1903—1958年）、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1918—）等等。

面对这一大批命运多舛的苏联作家，人们不禁会问：他们为什么会遭到错误批判？他们复活的深层根源是什么？他们死而复

生的遭遇给我们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无庸置疑，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不仅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苏联文学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于促进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顺利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复活的苏联作家群的不幸遭遇大都与其作品的被批判密不可分。在本世纪苏联文学史上，曾经遭到批判的作品多不胜数。本书所选录的这些篇目，都是其中较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此外，还有大量没有发表就被禁锢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出自不同的作家，发表于不同的年代，但和苏联其他作品比较起来，却有着鲜明的共同特征，因而，遭到了相同的厄运。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诞生。但是要在旧的废墟上迅速建成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甚至比推翻沙皇政权更难。因此，苏联在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同时也发生了某些严重失误，暴露了苏联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某些弊端，如阶级斗争扩大化、主观盲动幼稚病、官僚主义等等。复活的苏联作家作品的第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对苏联政治弊端的大胆揭露和深刻讽刺。

白卫军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与红军相敌对的一个反动政治军事集团。许多旧俄知识分子参加了白卫军。其中，既有死心塌地、作恶多端的反动分子，也有被迫参加、一时迷误的一般群众，还有一些逐渐转变思想立场的觉醒者。但是，国内战争结束后，生存下来的一大批白卫分子，作为战争的失败者，几乎统统被视为洪水猛兽，成为被歧视、被排挤、被打击的对象。与此相适应，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白卫分子形象，也都是被嘲弄、被否定、被批判的丑类。然而，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屠尔宾一家的日

子》则一反当时社会上的传统观念，以一个军人大家庭为题材，第一次真实地描写了白卫军运动。这个家庭的主要成员都参加了白卫军，与共产党为敌。但结果，他们不是遭到死亡，就是在经历了可怕的失败和失望后，真正认清了上层统治集团虚弱、腐朽和反动的本质，最后彻底转变思想立场，真诚地拥护共产党，开始踏上了新的道路。剧本第一次成功塑造了白卫分子的正面形象，真实地揭示了白卫运动的复杂性，启示人们：白卫分子并非都是坏人，对他们应该区别对待，不应一概打击，从而间接针砭了当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虽然并不是主要描写阶级斗争扩大化，但其中某些重要章节和主要人物也直接涉及了这个主题。著名红军指挥员巴沙·安季波夫在国内战争中尽管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内战结束后，因曾经当过白卫军官而成为大清洗的对象，最后走投无路，开枪自杀。他的妻子，美丽，善良，聪明，憎恶沙皇制度，向往自由幸福。但也因丈夫的问题而被投入监狱。这是一个多么惨痛的悲剧。

主观盲动幼稚病，是初期社会主义建设中常见的一种社会病。其基本症状是：违背客观规律，单凭主观办事；头脑狂热，行动盲目；虚张声势，一意孤行，急于求成；往往以“革命者”、“共产党员”的姿态，打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号，干出一些愚蠢错误的事情，结果，既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又败坏了“革命者”、“共产党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名誉。普拉东诺夫的《查文格尔》就是一部大胆针砭主观盲动幼稚病的长篇小说。一群满怀热情的无产者，幻想一夜之间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在漫游了整个国家之后，选中一个偏僻的小城镇来进行他们的伟大实验。他们为最美好的愿望所激励，但不知道怎样把这种愿望化为现实。他们一开始就把资产阶级完全肃清，并消灭了所有公开反对他们的人，但由于他们

脱离了客观实际，终遭失败。一个铁匠最后总结道：“那些高喊革命的人，却使人民死于饥饿，共产党里尽是些可怜的庸人。”

布尔加科夫的中篇小说《不祥的鸡蛋》是一部巧妙揭露官僚主义的作品。它写一个教授发明了一种神奇的“生命之光”，一个外行领导为了利己的目的，把教授的科研成果，拿到“红光”集体农庄用来孵小鸡。结果孵出的不是小鸡，而是小爬虫。小爬虫不断生长，而且迅速繁殖，蔓延到各地农村，吞噬、蹂躏周围的一切，并且波及全国，威胁到莫斯科。政府派来红军扑灭怪物，但一无成效。正当灾难不可收拾的时候，北极的特大寒流突然降临，冻死了所有的怪物。小说以怪诞的形式，寓喻深刻的主题：官僚主义就象这些小爬虫，为害极大；只有尊重客观规律，才能消弥灾难。

客观地描写苏联普通军民的落后面，是复活的苏联作家作品的又一个突出特征。从描写对象上看，这些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表现红军战士英勇善战、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同时，也揭示了他们滥施残暴、粗野卑琐的消极面。巴别尔的系列短篇小说《骑兵军》的“一封家信”里，作者通过库尔久科夫之口，叙述了当白军的父亲一刀刀割死了当红军的儿子；另一个当红军的儿子为哥哥复仇又杀死了父亲。在“骑兵连长特龙诺夫”中，特龙诺夫公然违犯军纪，把军刀插进俘虏（一位犹太老人）的喉管。但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的荣誉感又使他不能容忍安留什卡抢劫俘虏的衣物，险些击毙他的红军战友。这位凶狠暴躁的指挥官，在敌机轰炸的危急时刻却把生的机会让给战士，自己英勇战死，死前甚至没有忘记把脚下的靴子脱下，送给机枪手。另一类是描写苏联普通人民群众身上存在的庸俗愚昧。皮里尼亚克的中篇小说《红木》描写了一个古代旧风俗根深蒂固的死气沉沉的乡间小镇。镇上的居民们，即使是那些共产党员，也都象“旧教徒”或17世纪的“神圣无辜者”那样生活和行动。作者对贝兹

杰托夫兄弟的钻营投机、深于世故，老雅可夫的因循守旧以及共产党员伊凡的庸碌无为等等都进行了深刻讽刺。

对压抑人性现实生活的揭露和对人道主义的呼唤，是复活的苏联作家作品的第三个突出特征。压抑人性，就是泯灭人的个性，践踏人的尊严，不把人当人看，而当成社会机器的零件或驯服工具。皮里尼亚克的中篇小说《永不消失的月亮的故事》就是对压抑人性现实生活的深刻揭露。小说描写红军将领加弗里洛夫患了病，党中央委员会命令要为他施行手术。加弗里洛夫本能地感到他不应该动手术。但上级领导认为“一个有用的工作者为了继续发挥作用，就得进行维修”而指令加弗里洛夫躺上手术台。结果加弗里洛夫死在了手术刀下。扎米亚京的长篇小说《我们》也是这方面的著名作品。作者以寓言的笔法描绘了存在于26世纪的某“孤国”的社会生活。孤国的居民以字母加数字代替姓名，元音是女性，辅音是男性。居民们的工作、思想、生活全归“大恩人”支配。每次饭后他们须按“孤国进行曲”穿一式的灰蓝制服，四人一行排队散步。他们的住房全部用玻璃制造，只有凭发给他们的粉红色证券进行性生活时才可以拉上窗帘。麦克风随时窃听一切对话。各条街道上都装有机眼和机器耳，所有居民的言行，从出生到死亡都被监视和记录下来。电刑用来对付叛逆者……。总之，在这个“孤国”中，人的个性，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幸福，一切属于人的东西，统统荡然无存了。

对压抑人性的社会环境揭露讽刺的反面，自然是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深切呼唤。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归来》与其说是描写红军战士从前线归来，不如说是讴歌战争结束后，爱、人性和对人的理解又重新回到了苏联人民生活之中。布尔加科夫的中篇小说《狗心》则是一部探索人性的讽刺杰作。小说描写一个著名外科医生进行的一次大胆实验：他把一个死去的普通青年的脑垂体和睾丸移植到一条迷途的狗身上。这条狗会说话，并具有人的

属性；但它变得十分粗暴、野蛮，以致外科医生不得不作一次还原手术。外科医生实验的失败警醒世人：某些人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去改造人的大脑（思想）和属性，但最终不能改变人的本性，因为人还有一颗跳动的心。“人的本性只有通过怜悯和仁慈才能改变；恐怖、强制和各种各样的暴行，无论它们是红的、棕的还是白的，都无济于事”。

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是一部直接探索人性，宣扬人道主义的重要作品。主人公日瓦戈既不满俄国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又不理解苏维埃新政权的某些政治措施。他反对一切具体的暴力行为，厌恶红军和白军之间的残酷斗争。作为红军游击队军医，他既为游击队员治伤，又偷偷为白军士兵看病，主张“以善引导向善”。他还公开反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普遍改进思想”，主张人的“自我完善”，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由此可见，日瓦戈医生是一个典型的人道主义者形象。

表现作家的自我生活和内心世界，也是复活的苏联作家作品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一些抒情诗歌中。代表诗人有：叶赛宁、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古米廖夫、巴尔蒙特等等。他们被批判的许多诗作，大都描写爱情的向往，友人的怀念，失意的苦闷，个人的不幸，前景的暗淡等等，带有明显的“自我表现”色彩，调子显得低沉、忧郁、悲伤、甚至绝望。有些诗艺术上显得晦涩难懂。此外，左琴科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是一部自传性作品。作者从医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揭露和剖析了自己痛苦复杂心情的成因，并描绘了他如何吸取教训，一一加以克服，使自己变得愉快起来，从而显示了生活的出路。它也可以看作是这类作品。

其实，上述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只是复活的苏联作家作品总体特征在不同方面的具体表现。复活的苏联作家大都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制度，具有自己的思想观点。他们往往站在人道主义

的立场上，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周围的一切，用自己的大脑去思索政治、历史、道德、以及他人和自我，然后根据自己对艺术与现实关系的理解，把自己观察和思索的结果，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由此可见，强烈的独立意识，则是复活的苏联作家作品的总体特征。

独立意识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条件。伟大的作家只有敢于独立地俯瞰人生，探索真理，才能创造出人类的艺术珍品。但是，由于上述作家的独立意识大都表现在揭露社会阴暗面上，而另一方面，苏联长期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对文艺的真实性、歌颂与暴露、艺术风格等重要文艺理论问题存在着片面的理解，所以，他们的作品往往被指责为“诬蔑”社会主义和“诽谤”苏联人民而遭到批判。

一个作家一旦在政治上遭到批判就等于被宣判了文学死刑。从此，他的作品被禁锢起来，他的名字被人遗忘，在文学的世界里，他好象真正地死去了。

二

但是，作家的生命是独特的。在文学接受领域中，有的作家虽然活着，但他的作品如果没有人阅读，无异于他已经死去；相反，有的作家虽然死了，但他的作品拥有广大的读者，实际上他仍然活着。作家的生命是与作家的作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真正伟大的作家尽管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甚至在肉体上被毁灭，然而，只要他的作品还在，那怕暂时被禁锢在政治的铁笼里，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总有一天会获得第二次生命。复活的苏联作家群不正是历史的证明吗？

不可否认，一大批苏联作家的复活，与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更替，政治形势的变化，文艺政策的开禁密切相关。但这只是外在的、表层的因素。苏联这群作家的复活，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

内在的、深层的社会历史根源。

综观苏联文学史上的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四个方面的历史错误：第一、无限上纲。如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通过猴子的观察和思考对当时苏联某些现象进行了评议和嘲讽，但却被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攻击为“嘲笑苏联生活、苏维埃制度、苏联人”。^①第二、全盘否定。例如，左琴科是苏联二三十年代著名的幽默讽刺作家。他的作品曾受到高尔基的高度评价。1939年左琴科获苏联劳动红旗勋章。但是，日丹诺夫却无视历史，仅以《日出之前》和《猴子奇遇记》为根据，全盘否定了左琴科的创作成就和政治倾向，认为：“左琴科……最近的‘作品’决不是偶然的東西。它们不过是左琴科从二十年代就开始了的全部文学‘遗产’的继续。”“左琴科过去和现在都不喜欢苏维埃制度。他过去和现在对苏联文学都是歧视和敌对的。”^②第三、人格侮辱。如联共（布）中央在《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中，责骂左琴科是“文学无赖和渣滓”^③；日丹诺夫称阿赫玛托娃“并不完全是尼姑，并不完全是荡妇，说得确切些，而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④；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特纳依把帕斯捷尔纳克比喻为“一头弄脏自己食槽的猪”^⑤。第四、株连九族。如果一个作家遭到批判，那么发表该作家作品的刊物也跟着遭殃，轻者公开检讨，改组编辑部；重者被勒令停刊，甚至祸及作协主席、市委领导以及肯定被批判作品的评论家等等。对左琴科、阿赫玛托娃、杜金采夫等作家的批判，都是举世皆知的典型例证。

马克思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

①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③④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41—42、34、45页。

⑤ 转引自薛君智《反思历史 呼唤人性》，《日瓦戈医生》译本前言第4页，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

的唯一判断者。”^①对于苏联文学上的政治批判，谁是谁非，广大人民群众有着自己的评价标准。许多读者往往不轻信报刊上的言论，敢于作出自己的“判断”。由于被批判的作品被禁锢起来，他们就去“黑市”不惜出高价购来阅读；有的读者甚至不顾被捕的危险，偷偷传抄被批判的作品。顺便指出，我们这里所谓作家的“复活”是就政治上而说的；就广大读者来说，被批判的作家从来就没有“死去”，他们的作品一直活在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灵深处。

文学无国界。被批判的作品不仅受到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而且还受到国外读者的欢迎。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小说在苏联国内不能出版，但在国外出版后，不到一年时间就出现了15种文字的版本，被称为“一部不朽的史诗”，“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并于1958年10月获诺贝尔文学奖。

不同的读者对于某些作品作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正常的。但是，那些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广大读者所喜爱的作品，必然有着自身的价值。综观苏联文学史上那些被批判被禁锢的作品，尽管它们出自不同的作家，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反映不同的社会生活，具有不同的艺术样式，但它们大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这就是艺术的真实性。而真实性正是艺术本身强大生命力的根源所在。虚假的艺术是短命的；只有那些真实地反映客观社会生活，真实地表现作家主观思想感情的作品，才能突破时空的局限，获得永恒的艺术魅力。巴别尔说：“文学不是伪造物”，“我不会臆造”，“我的座右铭是‘真实性’！”^②这也道出了整个复活的苏联作家群创作的奥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0页。

②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巴别尔是怎样写作的》，载《当代苏联文学》1987年第4期。